



王靖獻教授 (1940-2020) 紀念專輯

王靖獻



## ※ 王靖獻教授紀念專輯 ※

# 王靖獻教授紀念專輯導言

廖肇亨\*

中研院文哲所首任所長王靖獻教授於二〇二〇年辭世。他作為文哲所正式成所後第一位走馬上任的所長，可以說是中文學界特殊崇高的存在。雖然，任職的時間不長，但仍然留下一定程度的影響。

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於一九八九年成立，首任籌備處主任為吳宏一教授，之後歷經戴璉璋、鍾彩鈞兩位籌備處主任，終於在二〇〇二年正式成所。王靖獻教授早年筆名葉珊，後更名楊牧，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後赴美留學，取得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東華大學、政治大學；二〇〇二年擔任文哲所所長，二〇〇四年離任。二〇二〇年王靖獻教授辭世，留給學界與文壇無盡的追思與想念。本所特別企劃此一紀念專輯，藉以表達對於前任所長的孺慕之情。

本專輯作者包括單德興、張力、林淇瀆（向陽）、鄭毓瑜、吳冠宏、須文蔚、潘少瑜、何雅雯、廖肇亨、林維杰等人。從年輩來看，盡皆屬於門人下屬的世代。王靖獻所長辭世以後，臺灣文壇各界不斷發表各種紀念追思的文字，但關於王靖獻所長任職於中研院文哲所這段期間的種種，外界知之較少，亦罕所著意。但不論是對於其生命歷程的研究，或對臺灣學術傳承演變的認知，這段經歷似乎都有必要重新認真檢討。

專輯作者群都曾經在生命不同階段，跟王靖獻故所長有所接觸。張力、單德興就讀政大西語系時因緣際會，得以結識當時正在臺大外文系客座的王靖獻教授。鄭毓瑜教授則是在訪問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期間與王靖獻教授結緣，並從之間學。林淇瀆（向陽）則是從年輕開始創作之時，便為王靖獻教授一路賞識提拔，後來又在東

---

\* 廖肇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華大學成為同事。吳冠宏、須文蔚同樣是王靖獻教授在創辦東華大學文學院時，任職中文系的同事。當時王靖獻教授任院長，鄭清茂教授任中文系主任，系上有顏崑陽、王文進，後來陸續加入許子漢、許又方、郝譽翔、謝明勳、謝明陽等諸多青年才俊，開創了一個創作與學術並重的園地，流風所及，迄今令人懷想。何雅雯則是以楊牧為其碩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就讀臺大時，曾每週遠赴花蓮聽課；至此世代，以楊牧的文學創作為研究主題，已進入學院體制。潘少瑜則是王靖獻所長在文哲所時期的助理，對於王靖獻所長有近身接觸的經驗，自非一般人可以比擬。至於廖肇亨，則是文哲所古典文學組的研究同仁，王靖獻所長服務於文哲所期間，仍當初出茅廬，於王靖獻所長雖非授業門生，亦執弟子禮。筆者少年期間於楊牧之作品口誦心惟，有朝一日，竟能與之同事，實乃三生有幸。筆者親從鄭清茂先生受教，二人相知最深，亦多從鄭老師處得聞二人與當時柏克萊學圈諸多軼事秘辛。林維杰教授一文則代表文哲所文學組以外的同仁對王靖獻所長當時的追憶。

王靖獻所長在文哲所期間，應該是這個學術研究的最高殿堂文藝風最盛的時刻，他也為這個所的自由學風奠定重要的基盤。謹以此專輯紀念一位偉大的詩人學者在南港的一段日子。

## ※ 王靖獻教授紀念專輯 ※

# 猛志逸四海——懷念楊牧先生

單德興\*

中學時為了專心準備聯考，我禁絕了課外書。直到進入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在良師益友的提點下，逐漸進入文學世界，也是從他們那裏知道了葉珊／楊牧這號人物。

「良師」是余光中老師，他在大二的英國文學史課堂上，不時提到當時臺灣文壇的情形，印象中曾兩次提到楊牧。一次是余老師為《中外文學》主編一九七四年六月的「詩專號」。當時出現一些批判臺灣現代詩的聲浪，此專號除了刊登前行代與新生代的詩作之外，還邀請了現代詩人與學者撰寫綜論與專論，頗有回應的意味。時居西雅圖的楊牧撰寫長詩〈林冲夜奔〉，並以〈致余光中書〉作為專號後語，以書信體強力反駁那些批評，和余老師的前言〈詩運小卜〉相互輝映。出刊後，我和班上不少同學都買了一本，以了解臺灣詩壇現況。另一次好像是《中國時報》連續兩天連載楊牧的散文，刊出的第一天，余老師便在課堂上說，如果我們寫得出這樣的散文就好了。

「益友」則是大二時自中文系轉入西語系的張力。他就讀高雄中學時便是文學青年，既寫詩，也寫散文，還編輯校刊。我有意一窺當時臺灣文學樣貌，便請他介紹一些書，記得他推薦了《葉珊散文集》、《請坐月亮請坐》、《六十年代詩選》、《七十年代詩選》等。我隨即買來閱讀，增長了些許見聞，但很難說有什麼心得。兩人絲毫不知冥冥中有條線牽引著我們日後與楊牧相會。

一九七五年秋，我們就讀大四，張力為了政大的新詩朗誦比賽，經由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余老師推薦，計畫邀請該年在臺大外文系客座的楊牧擔任評審，因此有了交集。與此同時，政大一群文友有感於多年前的星座詩社煙消雲散之後，

---

\* 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後繼無人，有意成立詩社，取名「長廊」。熱心推動此事的有東語系的黃維君、施至隆，新聞系的陳家帶、孫瑋芒，中文系的游喚，還有我們班的張力、沈文隆等人。我雖不寫詩，但樂觀其成，附庸風雅地在交給校方的成立社團申請書上簽名。也因為長廊詩社的籌劃、創立與後續活動，多次與楊牧見面。

如今回想，楊牧當年不過三十五歲，不僅早以詩、文聞名文壇，而且是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比較文學博士，任教於美國大學，並與林衡哲合編《新潮叢書》，發揮重大影響。我就是從那套叢書初次接觸到陳世驥、夏濟安、杜維明、鄭愁予、鍾玲、陳芳明等人的作品，當然也包括了楊牧本人的《傳統的與現代的》。因此，我們對「王老師」的尊重不在話下，卻也因為沒有正式的師生關係，得以純粹以文會友，喝酒聊天，不知是不是他那段客座期間最無拘無束的時光？

王老師不把我們當外人，我們也相當「賓至如歸」。尤其時至冬日，我們不時前往叨擾，到他金山街的住處吃火鍋，彼此「分工合作」，我們從木柵帶著鍋碗瓢盆和火鍋料過去，他則提供多種酒類，但只飲啤酒。有幾次還不無得意地說，他會輪流跟附近兩家雜貨鋪叫酒，以免店家奇怪為什麼他的啤酒消耗量那麼大。

那段期間有兩件事印象比較深刻。一是張力因為邀請他到政大擔任新詩朗誦評審，特地由同班同學、也是第一屆首獎得主胡為明，在詩人面前朗誦他創作的〈延陵紀子掛劍〉。當初在比賽現場，胡為明第一行一唸出來，其抑揚頓挫與戲劇感就震懾全場。這次當面朗誦，詩人聽了之後沉吟半響，才緩緩地說，沒想到自己的詩作可以如此用聲音來詮釋。

另一件事則與我有關。有一次我們幾位男同學前去拜訪，王老師提到《中外文學》跟他邀稿，但他苦於無暇撰寫，有意找人把已出版的英文論文“Towards Defining a Chinese Heroism”譯成中文投稿。由於我先前幾次在政大的中英翻譯比賽得過獎，大夥便起鬨說我得過翻譯獎，能力有多好云云。我趕忙推辭，表示那只是大學生的比賽，自己沒譯過學術論文。沒說出口的是，當時為了全力拚外文研究所入學考，我連已報名的預官考試都放棄，深恐備多力分。王老師則鼓勵我翻譯，並說他可幫著訂正譯稿，我才誠惶誠恐答應下來。當天因為待得太晚，沒有公車回木柵，眾人留宿，我則花了不少時間閱讀論文，成為張力筆下「眾人皆醉他獨醒」的人。

次日上午與王老師討論，大致決定一些專有名詞的譯法。由於首次翻譯學術論

文，過程中戰戰兢兢，也查找了一些資料，包括重讀《傳統的與現代的》以充實背景知識。譯稿出來後，王老師做了一些修訂，但印象中似乎不多，主要是標題由直譯的〈朝向一種英雄主義的定義〉改為〈論一種英雄主義〉，其他包括專有名詞以及小標題採用四字等。直到多年後我修訂別人翻譯我的文章，多所更動，才體認到文采與學識俱佳的王老師對我多麼寬容。那還是手工寫稿的年代，記得當中有個註因為中譯後不需要了，他考量到若是刪除，底下所有註號都必須前挪，工程浩大，便說刪除後他會補個註，此事就此解決。另外他也根據經驗提醒，內文、尤其是註釋中的英文，一定要打字，因為不管手寫得如何清楚，鉛字排版時一定會出錯。

譯稿經王老師訂正後，我重謄一遍，好像是由他交給《中外文學》。〈論一種英雄主義〉一九七六年四月於《中外文學》刊登，剛好在我考研究所之前。稿費大約有一千五、六百塊，對沒有兼差的我來說算是發了一筆小財，然而自己只是譯者，便向王老師請示如何處理。他大方地說稿費歸譯者，但我總覺得受之有愧，因為他既是原作者，又是訂正者。於是想到木柵以產茶聞名，就到附近茶莊挑了一罐價位較高的茶葉，下次與同學前去時送上。王老師如此「大膽起用新人」，看得出對年輕學子的信任與愛護，也開啟了我的學術翻譯之路。

後來洪範書店開張，張力在那裏幫忙，每出新書都會送我一本，我就閱讀兼校對，因此洪範早期的書我每本細讀，並從張力那邊聽說了一些文壇與出版界的新聞軼事。常言道「讀其書，知其人」，而關於楊牧我則有幸得以進一步「知其人，讀其書」，領會更深。那段期間印象深刻的著作，包含有關自我定位的〈右外野的浪漫主義者〉，頗具入世意味的《柏克萊精神》，而詩文一體的《年輪》更令我深深沉浸其中，讀完全書的那個下午，舉目四望彷彿天地變色，感人之深竟至於此，是畢生難得的閱讀體驗。

楊牧以詩、文聞名，但他身為編者以及引介者的角色則遭人漠視。不論是費時十五年編成的《唐詩選集》，或主編的近現代文學選集，或為編選的文集、詩集撰寫的緒論、序言，甚至於為洪範各書封面內頁撰寫的作者與內容簡介，都反映了他的文學品味與價值判斷。若能將他為洪範書店這些書籍所寫的簡介集結成冊，以文字與封面對照，當可展現身為編者、引介者的楊牧如何引領文學風潮，以及洪範作為文學出版社的特色與貢獻。

後來我進入中央研究院從事英美文學與文化研究，曾在蔡元培館的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聽他演講，主持人為籌備處主任吳宏一先生，演講結束後，先點名所

外人士的我發問。由於我的研究領域包括美國文學史，於是問了幾個問題，包括編輯文選時的納入與排除，因為問題稍多，我還特地詢問他需不需要筆記，他表示不用，並一一作答。二〇〇二至二〇〇四年間，楊牧應聘到文哲所擔任所長，以他在學界與文壇的地位與人脈，邀請許多學者與作家前來演講。我去聽講時都會打招呼，但因現場人多，且有外賓在場，不便多談。

最後的結緣則是東華大學的楊牧文學講座。負責安排的曾珍珍邀我於二〇一七年三月針對翻譯發表兩場演講（「從翻譯出發——一位學者／譯者的反思」與「翻譯與評介——作者、譯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樑」），奇妙地連結上多年前因他而開啟的學術翻譯與研究。演講地點就在東華大學圖書館楊牧書房附近，我特地參觀了裏面收藏的楊牧文物、手稿、藏書等。那兩天曾珍珍都以電話向老師及師母報告活動進行情形，承蒙多所勉勵。曾珍珍還熱心招待遊覽七星潭等地，也帶我參觀她即將裝修完成的自建住宅，對新居充滿憧憬。然而不多久，她在新居失足墜地，蒙主寵召。而今年王老師也因病大去。思之令人惘然。

記得當年翻譯〈論一種英雄主義〉時，字斟句酌，其中遇到英文“ambitious”一詞，煞費思量，仔細揣摩文意，若譯為「野心」，未免野而不當，不符語境；若譯為「雄心壯志」，似嫌尋常，而且詞費。忽然想到前人研究陶淵明時，曾以其詩句「猛志逸四海」來形容陶氏本人，遂用於譯文中，並當面向王老師說明出處與用意，獲得首肯。回顧楊牧一生文學志業，不僅通曉多種語文，出入於古今中外文學之間，並將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化為詩、散文、論述、編輯、譯作，作品則有英、德、法、日、瑞典、義大利、捷克等外語翻譯，對生於花蓮、志在文學的楊牧而言，又何嘗不是「猛志逸四海」？！

2020年6月18日

臺北南港



## ※ 王靖獻教授紀念專輯 ※

# 兩扇窗——懷念楊牧先生

張 力\*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就讀政大西洋語文學系四年級，某日和助教聊到，兩年前余光中系主任舉辦全校性的新詩朗誦比賽，引起校園裏一陣熱潮，可惜余老師在學年結束後，赴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新詩朗誦比賽未能繼續。助教說：「你們可以做啊，系辦支持經費。」我和幾位同學商量後，決定延續此一傳統。

我們仿效兩年前余老師的做法，並由我致函余老師，請其推薦評審。余老師十分高興，推薦了前屆就擔任評審的痲弦、張健、羅門、蓉子等老師，首屆時余老師本人也是評審，這次他推薦了在臺大外文系擔任客座教授的楊牧。我大概是請系辦聯絡臺大外文系系辦，取得楊牧的電話號碼。我在電話中說明，余老師鄭重推薦他出任新詩朗誦比賽評審，我和幾位同學希望能拜訪他，並親自邀請。

楊牧住在金山街靠近信義路的巷內，二樓的公寓門上貼著一張比名片稍大的白紙，上寫著「王靖獻」。屋裏客廳和餐廳連在一起，另有臥房、書房各一，這是友人為他租下的房子，地方大致清靜。

我們幾位政大的同學進屋後，由我再度表達誠意邀請，獲得首肯。由於楊牧不多言，我們也有些拘謹，雙方談話時斷時續。突然有人發現牆角放著一箱啤酒，楊牧靦腆地解釋說他喜歡喝啤酒，一買就是一箱。然後又笑著說，他沒幾天就會喝完一箱，倘若一直在同一家買，會令老闆驚訝，於是他另外找了一家，兩家交替購買。看起來他對自己略施小計而兩全其美，頗為得意。此時一位同學提議：「以後我們可以找老師喝酒嗎？」楊牧欣然同意。

臨別之前，我的同班同學胡為明特地朗誦了〈延陵季子掛劍〉，這是她在一九七三年首屆新詩朗誦比賽時，勇奪冠軍的選詩。胡為明以右手單手捧著詩集，左手

---

\* 張 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國立東華大學榮譽教授。

輕搭在右手的前臂上，神態自若，以內斂、深沉的聲調誦讀，節奏急緩有致，情感細膩動人。楊牧聽完沉吟良久，緩緩地說：「我沒想到詩朗誦起來，會有這樣的韻味。」

那一年年底的第二屆新詩朗誦比賽之後，我們大約每個月會與楊牧聚會一次，除了有一次我們帶他去淡水老街外，其餘都是在他金山街的家中。每次大約有五、六人參加，由主人準備各式酒類，菜餚則由我們負責。有幾回我們買了火鍋料，到他家洗洗切切，冬夜裏邊煮邊喝酒邊聊，非常過癮；有一次我還特地帶了母親做的幾道拿手菜，大家一起品嚐。或許是因為我們不是他直接授課的學生，感覺他面對我們時特別放鬆。我們常常聊的是那段時間楊牧的近作、文壇軼事、東門町的生活所見，有時穿插校園裏的趣聞，混搭閒扯，無所不談。聚餐後若有剩菜，我們會打包帶走，但有好幾回卻是楊牧要求留下，說他隔天可以充飢。

有一回吃飽喝足後，楊牧接到電話，原來是楊弦剛為楊牧新作〈帶你回花蓮〉譜成了曲，想要演唱給楊牧試聽。楊牧要我們趕快把餐桌清理乾淨，說是對音樂家的尊重。於是我們有幸參與了這首新歌的非正式發布會。

有一次去他家的都是男生，大家喝起酒來毫不拘束，看到茶几有一篇楊牧的英文論文，他說《中外文學》向他約稿，他沒時間寫，想把這篇論文譯成中文投稿。於是大家起鬨，要連續幾年獲得校內翻譯獎的單德興承擔論文中譯任務。當晚非常盡興，根本沒注意到已經半夜，沒有公車回木柵了。楊牧回臥房就寢，我們幾位同學就在客廳的沙發上隨意而臥。德興則幾乎通宵細讀論文。次日早上，大家又圍坐在餐桌，聽兩人討論論文內容。幾個月後，這篇譯作〈論一種英雄主義〉就在《中外文學》刊出。那是德興的第一篇學術翻譯，就是在那個眾人皆醉他獨醒的夜晚展開的。

一九七六年，幾位同學在政大成立了「長廊詩社」，邀請楊牧作首場演講，結束後，我們邀請他留下來一起喝酒。我們帶著他從四維堂一路走到籃球場，大夥兒就坐在地上喝起啤酒。其間有一位校警騎車經過，看了我們一眼，一句話都沒說就轉往別處。楊牧就說：「校警是世界上最好的警察，他們是要保護學生。」球場酒聚之後，我們之中有幾位忙著考研究所，叨擾楊牧的聚會就暫停了一個多月。

我僥倖考上政大歷史研究所，正在考慮是要先服預官役，還是先讀研究所，此時楊牧和我聯絡，告訴我他要成立書店，問我能不能幫忙？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工讀機會，決定先念研究所。那年我們一群人最後一次和他聚會喝酒時，楊牧高興地

向大家宣布洪範書店即將成立，準備出書。有人好奇問道：那不就是出版社嗎？楊牧解釋說：「不是。早期上海的出版社大都叫做書店，我們將來有機會也要成立店面，還可以賣賣鉛筆、橡皮擦。」沒想到他對書店有如此童趣的想像。

楊牧把我介紹給其他三位創辦人痲弦、葉步榮和沈燕士先生，過去曾聽過痲弦的演講，葉先生和沈先生則是初次見面。我後來才知道，開書店是楊牧和葉先生中學時代就有的夢想，現在終於實現。一九七六年夏天，洪範書店正式成立前，已有五本新書發排，幫忙編輯的是《幼獅文藝》的黃力智先生，也是這份月刊主編痲弦的屬下，我則負責新書的校對。四位創辦人對叢書的要求極高，我兢兢業業地工作，力求完美。痲弦有一次給我兩本《詩學》的校樣，要我校對，好讓我賺一點外快，我校完後還給痲弦。隔了幾日他遇見我，對我說：「橋橋說，這年輕人做事挺認真的。」然後把校樣還給我，我翻看一遍，發現他又挑出一些錯別字。我一則為自己的疏忽感到汗顏，另則由衷佩服資深主編的工夫。從此我更加嚴謹地校讀，偵測錯字的能力就慢慢增強了，尤其後來在閱讀學生論文時，往往對錯別字特別敏感。

我算是洪範初創時期的唯一員工。到了夏末，楊牧返西雅圖任教，不久之後痲弦也到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學位，沈先生忙於本身的工作，葉先生成了與我最常見面和聯繫的上司。我在力智兄指導下，慢慢熟悉編輯的工作。洪範偏愛鉛字排版，感覺書中文字有如立體。我常待在西昌街的永裕印刷廠中，看師傅如何檢字、排版，甚至上機印刷時還要特別注意有無掉字。每年暑假印刷廠忙著印教科書，不免耽擱其他印刷品的作業，這時編輯更要隨時待命，一面盯著印刷廠，一面隨時解決問題。

文字編輯和校對由我負責，葉先生統籌封面事宜，他有空時也會加入校稿。當時的文學書籍大多中規中矩，我大致追隨力智兄的原則，所以洪範早期的書看起來風格一致。我的編輯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美人圖》。王禎和在書中提到了余天和港星阿B（鍾鎮濤），堅持要在這兩人的名字下方插入照片，他的理由是幾十年之後，讀者就不知道兩人長什麼樣子。這樣一說，我們也覺得有理，就照辦了。

洪範成立時，先在林森北路三八〇號七〇七室分租了一間小辦公室。書出版前，我們就忙著寄發新書消息，等待讀者的劃撥單。當時通常是四、五種書一起印刷、出版、上市，主要是考慮到節省寄書費用及發行成本。我們收到劃撥單後，需

要將收件人姓名、地址一個一個抄錄在白紙上，然後貼在以牛皮紙裹好裹緊的幾冊書上面。很快地，劃撥單愈來愈多，在那個沒有電腦的時代，我們花了不少時間抄寫、包書、寄書。

記得葉先生和我第一次去中山北路的郵局寄書時，兩人各捧著一大落書，短短的一小段路，感覺愈來愈沉重，雙手痠得幾乎扛不住。好不容易到了郵局，卻因不知需要填大宗單，遭到郵局人員數落。之後我們才明白大宗郵寄有其程序，也知道事先填好大宗郵件單可以省很多事。後來書店添購了一臺直立式手推車，省了不少我們寄書的力氣。

這段期間，楊牧總會在暑假回臺灣，有回他約我在臺大附近的咖啡廳，拿著《楊牧詩集 I》的校稿，隨意翻開幾首詩，告訴我主要在描寫什麼。然後他鄭重、仔細地解釋標點符號的各種準則和細節，以及他個人習慣的用法，例如他寫文章不用頓號，因為標點符號是西方移入的產物，英文的標點符號中沒有頓號，都是用逗點。

我在大學時喜歡攝影，有回在楊牧家聚餐時帶了相機去，楊牧穿著長袍和大家一一合照。他特別滿意其中一張和某位同學合照中的自己，囑咐我洗成兩吋半身照。其實由彩色負片洗黑白，效果欠佳，我說我可以用黑白底片幫他照一些，但他還是說那一張最好，於是那張我認為不夠好的半身照，就被他用為官方版照片了。一九七九年他結婚時又叮囑我和黃力智擔任攝影，我不記得當時婚宴上是否另外聘請了專業攝影師，只記得當天楊牧喜不自勝。幾天後我將洗好的照片連同底片交給他，他看了非常滿意，可惜當時忘了自己留下一份。

楊牧結婚後返美定居，我也在一九八二年二月考入新聞局，於是離開了洪範。但楊牧對於我和我當時的女友（後來的內人）仍然非常關心，知道我們有意赴美讀書後，他寫了一封長信建議我們到他所任教的學系，分析各種利弊，替我們考量各種因素，鼓勵我由文而史也是一條可以嘗試的道路。但我後來申請到哥倫比亞大學，決定繼續攻讀歷史，辜負了楊牧的美意，也一直對楊牧感到歉疚。之後我們偶有通信，見面機會更少。

一九九六年我得知楊牧回到花蓮，在東華大學擔任人社學院院長，那時我已在中研院近史所服務了十二年。一九九八年，楊牧打算在人社學院成立歷史系，請謝國興教授撰寫規畫書，不久他得知國興兄是我的同事，於是立刻跟我聯繫，簡單敘舊後，就要我幫忙國興兄規畫。此事義不容辭，我就補充了兩項規畫構想。由於歷

史學系畢業生出路有限，我私心認為教育部應該不會通過此申請案。

一九九九年三月，我接到楊牧電話，告訴我教育部原則上通過歷史系申請案，他非常高興，因為「文學院一定要有中文系、外文系、歷史系和哲學系。以後我們再看情況設立哲學系」。原來的規畫書需要少許補充說明，楊牧請我幫忙，並由院辦公室的林君鴻祕書和我保持聯繫。這仍是規畫工作的延續，我就幫忙草擬回覆教育部的文稿。此時也不免想到，楊牧會不會要我更進一步的協助。

兩個多月後楊牧來電，得知我有教育部的副教授證書後，立刻就說希望我擔任新成立的歷史系系主任。因為我在研究院的工作穩定，學術資源豐富，而且我沒有大學行政工作的經驗，於是就婉拒了。同時我也告訴他，我雖然已經有政大的博士學位，但先前有個機會赴國外大學就讀博士班，還在撰寫論文階段，我想將它完成。對於我的理由，楊牧不能認同，他勸我別再想另一個學位，因為我已不需要再憑學位謀職了。繼而動之以情：「你想想看，能有一個機會創辦一個新系，是多麼難得。」「我跟你說這些話，我是把你當自己的弟弟看」。那幾日我反覆思索楊牧的話，頗為感動，也有一些心動，和內人討論之後，決定接受邀請。

我第一次到東華大學，楊牧安排我和校內幾位一級主管餐敘，再開車帶我駛過廣闊的校園。途經草木叢生的北半部校園時，他告訴我：「裏面有野兔，還有其他的小動物。」幾日後我在臺北拜見了牟宗燦校長。此後雖然有一些我個人借調手續的小問題，但一切堪稱順利。第一屆歷史系的新生，就在「九二一」強震的當天晚上，參加了迎新會，宣告東華歷史系的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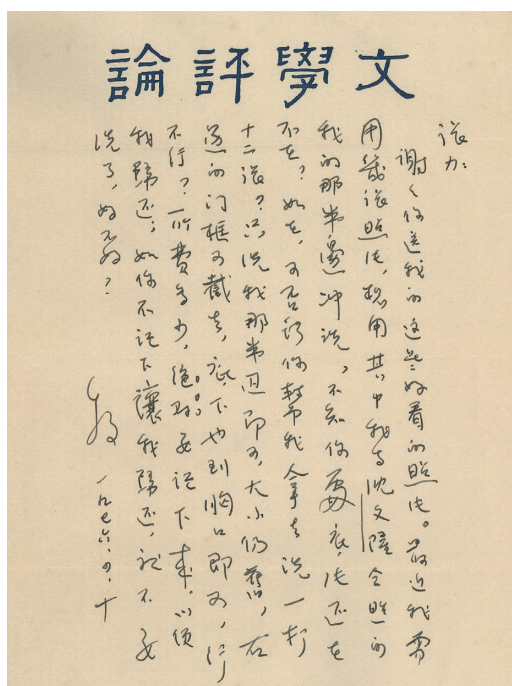
有回他打電話到家裏給內人，為的是隔天要參加的婚宴，一位史學界的朋友娶媳婦。他問內人紅包應該包多少錢，然後跟內人說，他擔心自己不太認識其他賓客，要內人幫他留個位置。內人和他十多年未見，隔天相鄰而坐，楊牧侃侃而談，得意地說兒子跟他感情很好，返美讀書轉機時還要打電話跟他聊天，然後描述盈盈師母如何幫新居找到一個很有古意的書桌，也是一臉滿足。後來他提到師母喜歡划船，她和船友需要一起舉臂抬船步行到海邊，那是很重要的一個儀式，然後信手拈來幾個西洋古典文學中有關船的典故。一時之間，我們彷彿回到當初金山街的聚會，他還是那個優游在文學與現實之間，瀟灑地自由出入的楊牧。

我一直以為楊牧找我，讓我有幸成為洪範初創的一員，是因為我在籌辦新詩朗誦比賽時有條有理，得到他的肯定。後來內人問了他這個問題，楊牧說是因為那次一夥人到籃球場上飲啤酒，走到半途時，他發現我不見了，過了不久，看到我搬著

一箱啤酒到球場，覺得我這個人 sophisticated。他特別強調，這個字對他來講是正面的意義，表示成熟、練達。洪範是楊牧為我開的第一扇窗，讓我持續接觸優秀的文學作品，也讓我累積出版實務經驗。後來我在中研院近史所服務，也參與所內的出版業務，基本上就是以洪範為師。洪範叢書封面折口的作者與內容介紹，文字精練，敘述精闢，一直被視為典範，我也試著在近史所每一本書的折口加上簡介。

在東華服務是楊牧為我打開的第二扇窗，感謝他的信任，給予完全的支持，使我能和全系師生共同創造了歷史。我把學生看成我的同輩，一起學習，系內運動風氣甚濃，教師和學生打成一片，以致漸漸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系風。去年東華歷史系成立二十周年，兩百多名歷屆系友攜眷返校，兩天的「回娘家」活動熱鬧非凡。看著學生帶著家眷舟車勞頓重返花蓮，爸爸或媽媽下場參加球類比賽時，另一半牽著兒女的手在場邊加油打氣，感受全系強烈的向心力。學生以母校母系為榮，他們給我的回饋，讓我的人生增添了不同的意義。

（本文原刊載於《聯合報·副刊·文學紀念冊》，2020年5月19日，後收入須文蔚主編《告訴我，甚麼叫做記憶：想念楊牧》，時報文化2020年出版）



這是楊牧寄給我的第一封信，1976年4月10日寄出。我們在4月初曾有一次聚會，大家分別和他合影。信中提到的沈文隆，是我在政大西洋語文學系的同班同學。

## ※ 王靖獻教授紀念專輯 ※

# 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 ——追思詩人學者楊牧先生

向 陽<sup>\*</sup>

詩人、學者楊牧先生已於三月遠行。春草芳菲、重樓啟曙，他的離去，讓文壇和學界都為之震驚、不捨。

作為詩人，他是當代臺灣文壇重鎮，一生創作不懈，詩與散文並茂，均被推為臺灣當代「十大」作家之列，著作多達六十餘種，並先後獲得吳三連獎、國家文藝獎、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及瑞典蟬獎之肯定；作為學者，他追隨陳世驥教授治《詩經》，取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後，即在美國任教長達三十年。歷任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東華大學教授兼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並曾擔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首任所長等職，學術成就也備受肯定。

除此之外，較不為人知而貢獻厥大的，則是他作為編輯人的貢獻。早在一九七〇年代，他就和林衡哲合作，為志文出版社編選《新潮叢書》，開創臺灣出版界重視文史哲新知的風潮；也為《聯合報·副刊》主審現代詩稿件，拔擢眾多戰後世代青年詩人，為現代詩壇注入活水；一九七六年又與葉步榮、痲弦、沈燕士等共同創辦洪範書店，嚴選文學書籍，與純文學、爾雅、九歌、大地等出版社同被譽為「五小」，締造其後臺灣文學出版的高峰。他所編選的詩編、文選更多達十餘種，要者如《唐詩選集》，歷時五年方才完成；三〇年代作家詩文選，如《徐志摩詩選》、《徐志摩文選》、《許地山小說選》、《許地山散文選》、《周作人文選》、《豐子愷文選》等，開風氣之先；另外，《現代中國詩選》、《現代中國散文選》更是涵蓋現代文學發展歷程的重要選集。

---

\* 向 陽（林淇濤），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楊牧先生一生大概就以這三條軸線交織發展，成就了他繁複絢麗而又博大浩瀚的文學生命。他的詩，兼容古典、浪漫、寫實與現代主義的精髓，化用中外文學的傳統與典故，又能活學轉益，這讓他的詩藝於登峰；他的散文，前期婉約，充滿浪漫的想像，後期沉穩，敘事與抒情並用，而成其恢弘坦蕩格局。詩文之中，也常見他的學術訓練與思維相與貫串，體制謹嚴，發人深省；而裁選新秀詩作、選編名家詩文等編輯作為，則可略窺他海納百川、山容千樹的襟懷。如今斯人已去，更教人不捨。

我是楊牧先生的後輩，從年輕時習詩投稿而與他相識。他的詩文一直是我反覆誦讀、沉吟其內的佳構，也在創作過程中受到諸多啟發；而在四十餘年淡如水的往返中，他更是我創作生涯中相當感念的提攜者。一九七五年他為《聯副》選詩時，我二十歲，開始寫詩投稿，詩作均蒙他不棄，獲刊於《聯合報·副刊》，鼓舞我繼續創作的信念；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他任教的華盛頓大學研究室，陳芳明兄帶我去看他，他從書架拿出杜嘉德 (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 編的《廈門音漢英大辭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贈我，鼓勵我持續臺語詩寫作的一幕，迄今仍鮮亮如昨；一九九九年，他交代洪範書店為我出版選集《向陽詩選》，並親自撰寫封面摺頁作者簡介，給予我「融合傳統與鄉土，兼現代感知和寫實，自關蹊徑，蔚成風格」的鼓勵，更讓我感遇在心……。在我創作的不同階段，他總是不吝伸出他的手，賜我力量，給我無聲的鼓舞。他是一位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但聽其言也不厲的儒者。

四十多年來，楊牧先生與我因為同在文壇、學院，見面的機會算來也不少，有時是一起擔任文學獎評審，有時是在文學圈的聚會相談；二〇〇三年我取得博士學位，赴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任教時，他雖已擔任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長，回花蓮時還是會在東華見到面……。但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會晤，則是我到他在臺北的住家訪他，談到一九七五年他為《聯副》選詩的舊事，他興奮地從書房拿出一本珍藏多年的剪貼簿，指點我看他當年剪貼的詩稿：「這是楊澤的、這是羅智成的……這是你的……。」那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初交的某個夏日午後，我眼前的楊牧先生，彷彿又回到一九七五年的青壯時光。

如今楊牧先生遠行了，讀他的詩文，追思他的書寫，頗有「鐘聲成排越過 / 頭頂飛去又被一一震回」的感覺。這句詩出自他的名作〈介殼蟲〉，是他二〇〇三年擔任中研院文哲所所長時所作，全詩如下：



蘇鐵不動在微風裏屏息  
暖冬野草依偎前排欄杆喧鬧  
開花，我以遲緩的步伐  
丈量巨木群後巍巍的暮色成型  
沉默折衝，學院堂廡之上  
一個耳順的資深研究員

小灰蛾還在土壤上下強持  
忍耐前生最後一階段，蛻變前  
殘存的流言：街衢盡頭  
突兀三兩座病黃的山巒——  
我駐足，聽到鐘聲成排越過  
頭頂飛去又被一一震回

完整的心律隨斜陽折射  
在前方：波谷明亮顯示掃描器  
金針下常帶感情，然而，相對  
於遽爾，即刻，啊記憶裏  
那悠遠的鐘，這時撞擊到我的  
無非一種回聲猶不免誇誕，張揚？

況且，真實的接觸反而不曾在  
金屬肉身引發感應，或者  
悉數掩藏在垂長的臺灣欒樹裏  
就在我失神剎那，音波順萬道  
強光氾濫，我看到成群學童  
自早先的大門擁出來

我把腳步放慢，聽餘韻穿過  
三角旗搖動的顏彩。他們左右

奔跑，前方是將熄未熄的日照  
一個忽然止步，彎腰看地上  
其他男孩都跟著，相繼蹲下  
圍成一圈，屏息

偉大的發現理應在猶豫  
多難的世紀初率先完成，我  
轉身俯首，無心機的觀察參與  
且檢驗科學與人文徵兆於微風  
當所有眼睛焦點這樣集中，看到  
地上一隻雌性蘇鐵白輪盾介殼蟲

寫此詩時，楊牧先生六十三歲，所以自稱「學院堂廡之上／一個耳順的資深研究員」，前半部分寫學院的著述生涯以及他的秋暮心境（我以遲緩的步伐／丈量巨木群後巍巍的暮色成型），有為學九仞，戰戰兢兢的自省自惕；後半段，寫他因一群學童圍看介殼蟲，引發好奇，也跟著蹲下詳看，「且檢驗科學與人文徵兆於微風」的心緒。

這是楊牧先生的自述之詩，在他的詩中，「鐘聲」既是時間的喻依，也是已是的童年的表記。從童年時來到耳順的秋暮，想必他在回顧自己的著述人生、文學生命之際，也有「暮色成型」，時間無多的焦慮吧。楊牧先生於二〇〇六年將此詩收入同題詩集《介殼蟲》，並特別撰寫〈後序〉，詳述此詩撰寫過程和他的思慮，文末如此總結：

但願我們也像那頻頻跌撞的昆蟲，兀自不撓的希臘蒼蠅在玻璃光影裏對著召集令鼓翼，盤旋。然後接下來想到的，就是屢次被我們援引，無限敏感，超越的謝玄暉，和制奇定法，創造力不窮的韓愈：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出自韓愈〈雜詩〉，楊牧先生引之，固然是自嘲之語，也是自負之言。

二〇一六年，還只是四年前，七月二十九日，趨勢文教基金會為楊牧先生舉辦「向大師致敬——楊牧『讓風朗誦』詩歌展演」，邀請眾多詩人上臺朗讀楊牧詩作。當晚楊牧先生與夫人應邀於臺下全程觀賞，我朗讀的就是〈介殼蟲〉這首詩作。我

讀此詩時，感覺到楊牧先生為追求詩藝的孤獨與憔悴，卻也看到他篤定前行的堅毅和自信。在孩童純真的、好奇地眼睛下，看到的是介殼蟲的死亡；楊牧先生看到的，卻是頻頻跌撞的昆蟲為追尋光亮奮不顧身的悲壯，一如他一生在文字間鑽研的精神，而他相信：文字不死，他的詩文將如謝玄暉（謝朓）、韓愈一樣，被閱讀、被援引。

我也如此相信，楊牧先生雖已遠行，他的詩文將因不斷被閱讀、被援引而永世流傳。



## ※ 王靖獻教授紀念專輯 ※

# 悲傷快樂而遙遠——懷念楊牧老師

鄭毓瑜\*

真正見到楊牧老師，是一九九九年，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進修的時期。那時候對於老師的印象還停留在《葉珊散文集》，追求美與永恆的葉珊與濟慈幾乎合體，很難想像眼前就是我一讀再讀的《陳世驥文存》(1972)的編者，以及《陸機文賦校釋》(1985)的作者。第一次的會面，異常緊張，只記得忽然念出「孤獨是一匹衰老的獸，潛伏在我亂石磊磊的心裏，……」，然後，我們談起了阮籍與六朝。

二〇〇〇年後，有更多機會見面說話，一起聽老師喜愛的歌劇或古典樂，討論新近出版的書篇，談新聞事件，或學界相熟的友人。在評斷人事上，老師有嚴謹的界線，不輕易出言，也不能忍受越界的言行，但是在回憶往事的時候，則常常有真摯幽默的一面。有一次提起當年吳潛誠想讓學生用臺語演莎士比亞戲劇，老師還斟酌了「莎士比亞」的臺語發音。回憶起大學時期，最不喜歡上體育課，有一回體育老師要學生自己去量測跑百米的時間，楊牧隨意報了一個數字，體育老師瞪大眼睛說：「你突破世界紀錄了！」然而，更多時候，我其實是在聽楊牧老師說故事，那些我沒來得及參與的歲月，以及後來又後來的想法。

印象中，最長的兩次談話是在電話線上。大約是二〇〇〇年底，我將關於少年英雄夏完淳〈大哀賦〉的一篇文稿，送請老師指正，那是我注意到明清之際辭賦作品的第一篇。辭賦本來就典實繁複，加上明清之際世局倥傯，在查找比對上的確費了一番功夫，但是一邊寫一邊就愈發想知道，文學傳統到底如何對應亂局，歷經時代起落，知識分子究竟如何化用傳統文學，成為自我見證的言說。電話裏，老師的聲音比平日高昂一些，除了陳子龍、夏完淳，老師一口氣提起倪元璐、劉宗周、黃道周、黃宗羲、王夫之……等等，彷彿此起彼落，微渺卻又相續的星火。直到二〇

---

\* 鄭毓瑜，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一年入夏，在老師《隱喻與實現》新書中，讀到〈詩與抵抗〉，其中細數甲申之後二十年，那些超越榮辱的時賢與詩，於是懂得電話裏流露的是無限緬懷與歎惋，還有未完的寄託，在張煌言與鄭成功北征失敗後，〈詩與抵抗〉的最後一句，是「以孔孟之道教養，移化日本於德川時代達二百年的朱舜水」。

二〇〇一年十月左右，再次於電話上談的正是我已經投稿的朱舜水〈遊後樂園賦〉研究。這篇文章，是我對於遺民、貳臣、烈士、志士的持續思索，尤其是討論自我認同與價值評斷，如何因時空流轉，在寄居異邦期間，獲得重新思考的機會。電話那頭，老師忽然悠悠提起蕭公權先生、李方桂先生，早先都曾任教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都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居留異國作育人才，對於文化志業而言，原不應有政治性的國界區別。也許是朱舜水的緣故，老師的語氣裏觸及一九四九年以後，兩岸知識分子在身分與去留抉擇上的無奈，以及無時不在的重重顧慮。

處身於太平洋兩岸，以及不同語言、歷史與作品的交錯地帶，楊牧研究希臘羅馬文學、《詩經》、《楚辭》、唐詩、浪漫主義、近現代文學、臺灣詩學，寫新詩、散文與評論，更想像自己如同航向未知的遠洋船員，或是放眼無盡蒼鬱的森林守門人，看破一切人為的虛假的界線；但是，楊牧也說「安那其不是天生就安那其的」（〈大虛構時代〉），他必須經歷過種種現實與精神上的衝擊，目睹政權的驕恣與腐敗，然後決定「不」選擇。這時候所謂「家國之思」，不再局限於單一政權、國族或地域，反而是未預設立場的普遍追索。生長於二戰結束前後，一個多語族、政權更迭、轟炸與歧見並存的時代，層層的禁令，反而讓詩人看到自己，也看到他人；「詩並非絕對」，他決心讓所有的抒情與書寫，回到一個不熱衷、不好奇，而開放思索、衡量的「完整的空虛」（〈那一個年代〉）。

這讓楊牧更關注人事多音複調的脈絡，以及文字語彙於古今的意義相生，幾乎是以嚴謹的學術關懷，與新文學創作相互引生。比如〈武宿夜組曲〉（1969），「武宿夜」為武王伐紂前夕，軍士舞樂的曲名，並引用《尚書·泰誓（上）》「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自成首段，以史筆的冷漠，強烈對比後兩段所描述受傷戰士與孀寡棄婦的懦弱哭泣。如果不是熟諳典故，不可能對於這場聖戰有如此抗議與同情兼具的想像。出身外文系的楊牧，師從徐復觀、陳世驥先生，優游於中／西經典與理論，也錘鍊各種文本細讀的方法，在柏克萊就學時，甚至還選修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先生的「訓詁」學，疏證偽古文《尚書》〈武成〉篇，雖然只針對開篇一小段，竟然就寫了四十餘頁的報告，可見楊牧身懷傳統的小學素養。學術論文中，

如〈論一種英雄主義〉、〈周文史詩〉，都是著名的例子。楊牧認為《詩經·大雅》中〈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篇，正是周王朝建立過程的一組「史詩」，從考辨史料，追索字源，到提示隱喻，楊牧從容演繹出一個天命與人德相互接近的重要時刻。尤其是〈大明〉篇，最後一段描繪牧野之戰，本來車馬喧騰，蓄勢待發，卻以「會朝清明」一句，一個破曉的象徵，戛然而止。楊牧於註解中特別提到，關於這場武王伐紂，「血腥的戰爭場面在〈武成〉中多有涉及」，但是〈大明〉「不見任何恐怖汙染」；當年訓解〈武成〉的功夫，成為反問的起點，進而，楊牧自創“The Weniad”一詞，發現了抑武尚文、具有憂患意識的另一種英雄主義，也確立中國「史詩」的開端，正在於人文精神躍動的周初。

楊牧認為，中國文學批評往往是為表達個人的品味與知識，或者發現一種新的「人生哲學」，而並非為了講解或定義。探討《詩經》中的憂患意識以及人文精神，無疑是向徐先生的人格與風範致敬。而一九六六年以英文撰寫的〈詩經國風的草木〉是陳世驥先生「先秦文學」的課堂報告，其中考察詩篇的音韻、詩旨、格律、主題，甚至地理因素，面面俱足。一九七〇年開始撰寫博士論文“The Bell and the Drum: *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以古代中國口傳文學與古希臘以及古英文史詩相比較，尤其注意《詩經》中的一些作品，是如何透過套語主題的意象類比，來構成主題相互詮釋的效力。也可以說，是因為這個「聯想的全體性」(totality of association)讓所有利用類比意象的詩作，找到共感的、可體驗的意義。透過如此縝密的還原功夫，如此的理論實驗與證驗，楊牧不再以古典為「舊」文學，他說：「直到遇見陳先生，我才了悟三千年前的詩騷箴言也都永恆地『其命維新』。」(〈柏克萊〉)

陳世驥於於一九七一年美國 AAS 年會發表了著名的“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凸顯中國文學中著重自我傾吐的辭句和音響，同時立足於比較文學的角度，認為抒情詩或史詩戲劇這中/西兩大傳統，彼此互動與親近的現象，時時在發生中。這種普世的立場，與前一年楊牧與林衡哲開始主編《新潮叢書》的初衷，有相應之處：

對於上一代的某些人，所謂「新潮」曾經是「西潮」，曾經等於是驟然湧來的狂浪，拍打著東方古國的陸地；對於我們說來，「新潮」並不完全如此意味。這個時代的文化是彼此撞擊互相建設的文化。我們肯定新生的廣義的中國文明。(〈新潮弁言〉)

陳世驥於一九七一年一月為《夏濟安選集》（《新潮叢書》之六）作序，還引用了這段話，對《新潮叢書》的編印多所期許。如果我們以這樣的「新潮」觀點，重新看待「抒情傳統」，那麼這個在臺灣深耕近半世紀的文學研究領域，就不再是用哪個朝代、哪個文體、哪個國族可以區分，反而是在綿延的形成中，向外打開，去開拓、借鑑，同時自覺地要求與批判，並嚮往一種長期激盪與中和的新文明。

一九七一年五月，陳世驥先生驟然離世，楊牧回憶第一次去柏克萊與陳先生見面的情景，覺得「悲傷快樂而遙遠」。將近半世紀之後，楊牧老師乘「雲舟」遠去，我們重新體驗了這句話所意味的，生命中那些偶然與必然的交錯，人與時間的相互周旋。但是，楊牧說「我想我對時間之為物並無必須的恐懼感」，因為：

通過時間，穿越那暗晦，不定，破碎，將所有短暫的意氣和靜默掇拾，縫在一起，並且再現我們曾經的英勇和憂鬱，使之長久，長久存在於一不斷生生的結構（而不僅祇為固定的文本）的，惟詩而已。（《楊牧詩集 II》自序）

「惟詩而已」，一個質樸的信仰，一種永恆的實踐，我懷念詩人與詩學家楊牧，以及二十年間，透過書寫言說，曾經帶給我的歡喜、苦思與啟示。

—— 2020年3月27日

（本文原刊載於《聯合報·副刊·文學紀念冊》，2020年7月18日，後收入須文蔚主編《告訴我，甚麼叫做記憶：想念楊牧》，時報文化2020年出版）



## ※ 王靖獻教授紀念專輯 ※

# 且掬起記憶海波中的粼光

吳冠宏\*

### 一、我們在尷尬、靦腆的臉紅中相遇

追憶起來，已有二十多年的光景，那時東華大學中文系陸續有不少年輕夥伴加入我們的陣營。有一次我邀約系上同事來我家餐聚，以略盡地主之誼，由於當時我還沒有抽到學人宿舍，因此暫住在吉安三十米路巷弄裏的社區。來訪者除幾位年輕同事之外，還有鄭清茂老師、楊牧老師。我雖然向來滴酒不沾，為使來訪的同事們有酒可飲，以免掃興，特從住家附近三十米路旁的雜貨店買了六瓶啤酒。知道自己縱使不解酒中趣，也當讓大家過過癮。當晚簡使用餐、相談甚歡後，隨即便各自或結伴開車回家了。由於楊牧老師說，他有朋友會前來接他回東華宿舍，因此原本同行的夥伴們就依他的要求，讓他獨自走至三十米路等待接送之友人。

內人開始整理飯桌上的菜餚碗盤，我看著六個啤酒空瓶子，想著或可趁雜貨店尚未關門，前去退瓶，於是沿著巷弄，悠然自在地走向三十米路旁的雜貨店。在幽黯中隱約看到裏頭有個人手裏拿著易開罐的啤酒盡興地暢飲著。仔細一瞧，我們的眼光交會在這不經意卻又彼此瞭然於一切的當下，楊牧老師的臉泛出尷尬、靦腆的紅，我感覺得到我的臉，亦逐漸如是。

此一銘記心頭的陳年往事，雖不時以楊牧老師說過「獨飲也有其孤高的境界」來釋懷，但終究不得不承認當晚的六瓶酒豈夠大家喝足盡興。他在〈六朝之後酒中仙〉裏曾經提到：「近代醫學昌明，一般人都強調酒與遐齡之間的衝突，所以許多長輩在飲酒半生之後，輒主動地或被動地戒了；不但自己戒酒，也勸我們晚輩少喝

---

\* 吳冠宏，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或根本不喝。通常勸說的人總是充滿了誠意，聽訓的人則始終是藐藐的。」<sup>1</sup>難怪早先朱戈靖醫師提醒他不可以再喝酒了，酒興來時，他仍淺笑地說，朱醫師的話聽聽就好。後來漸漸地變得不能喝了，陶公有云：「止酒情無喜。」他也就不喜歡跟大家聚餐了。有一次鄭清茂老師從桃園回來餐聚，楊牧老師難得出席，我還特別準備了幾瓶「黑麥汁」（聽聞其味最似啤酒），讓他可以過過癮。只是體驗過杜康豪情的他在不飲之後，縱使以汁代酒也不可能弄假成真，沮喪之情可想。

文哲所三十週年，以金門高粱作為紀念物，若連結到楊牧老師為第一任所長，就更饒富別趣了。金門是他練就一身酒膽的勝地，還常以「醉臥沙場君莫笑」解嘲。文學研究者每爭議於陶淵明〈飲酒〉二十首或為中年或為晚年之作，兩說總是對應於不同的政治事件與解釋<sup>2</sup>。楊牧老師關心的卻是，〈飲酒〉二十首只像薄醺境界下的產物，反而是〈止酒〉一首才像醉後所作。他所以能如此舉重若輕，當是專情於酒使然，而我獨愛他說：「酒如果能做為他玄思和正義的觸媒，酒之令德可以無愧。」真是對「酒德」的最高禮讚！只是文哲所三十週年的高粱酒紀念品，受限於經費，設計相當精美，身材卻如此苗條，喝不過癮的楊牧老師，看來又會想辦法悄悄地走到可以繼續暢飲盡興的地方了。

## 二、從詩文與哲解之間到套語的雅俗之際

二〇一五年五月在東華有春天讀詩的活動，我選楊牧老師〈易十四行詩〉兩首由侯建州老師朗誦而我隨之解讀，作為一段節目。觀楊牧老師在其詩作、編撰、學術研究上，每與《詩經》多所涉獵，相較起來，向來被視為漢華文化之源的《易經》，不知這位博學善感的詩人對此可否留下動人的印記？無意間我在《楊牧詩集》中發現了〈易十四行詩〉兩首，讀來分外珍貴與驚喜。若從十四行詩的詩體背景看來，這兩首詩在主題及表現風格上，可謂與十四行詩的傳統相互呼應，即高揚浪漫情懷、歌詠男女情愛，而不時呼喚著生命的激情。令人期待的是，東方《易經》的意象與西方十四行詩之體式，在此碰撞交會下，又會轉化出什麼樣的新氣象

<sup>1</sup> 引自〈六朝之後酒中仙〉一文，收入楊牧：《搜索者》（臺北：洪範書店，1982年），本文此段與下一段楊牧談酒，大都引自該文。

<sup>2</sup> 可參楊玉成〈徘徊——陶淵明〈飲酒〉二十首的風景與記憶〉一文，收入楊玉成、劉苑如主編：《今古一相接：中國文學記憶與競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9年），頁9。

呢？

觀第一首〈澤中有雷〉是〈隨卦〉之象而來，雷聲而震動，繼而是風翻雨澤萬物，在此可以傾聽到宇宙豐沛的生機在交疊作響，大鵬、鷓鴣、魚蝦，都處於俟機而動的狀態，當有取隨時之大義即隨順相從之意；然楊牧老師仍不忘以欲望為圓心，讓宇宙和我們的脈搏同步共震，是以縱使在隨時俟機，亦有如帶著蠢蠢欲動的想望，置身於虛靜的深夜之中，等待天明。第二首題為〈利涉大川〉，即為《易經》爻辭中時常出現的套語，有十條之多<sup>3</sup>，本來是指涉有利於進行艱難或高風險的事，在楊牧詩中卻轉為男女情愛的描述，表現陰陽交媾時的纏綿悱惻，洋溢著生之慾望的堅韌頑強與繁衍孳長。可見這兩首詩，正是他吸納西方詩體的風格與節奏，並取義於《易經》意象而進一步體現當代感文化的產物。

〈乾〉、〈坤〉兩卦向來被視為「《易》之門戶」，這兩首融舊納新的現代詩，一柔順隨從，二陽剛克難，何嘗不是一種新乾坤精神的體現。我娓娓道來其詩旨的微意，而當時的吳茂昆校長及鄭嘉良副校長聽完後，都不約而同地對我說：「經過你的解釋，我終於懂《易經》了！」本來在談楊牧詩，卻意外使聽者從現代詩的語境中轉為認識傳統經典的進路，豈不妙哉！只是楊牧老師對於我的侃侃而談，總是露出「笑而不答」的曖昧表情，看來並非不以為然，但終究不是默認了。對此，詩人絕對有「不言」的權利，而解人又何嘗不可以透過「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來自我辯解呢！

早在閱讀他《隱喻與實現》的〈序文〉時，我便注意到楊牧老師詮解《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一句，每喜從文人有感於時間之推移及感歎入手，而對於宋儒據此發現道體流行的說法終是有隔。即使他並不否認此言已觸及無限精神的啟示<sup>4</sup>，想必是他認為對於恆常之理先置而不論，方能讓流變的感覺經驗充分被釋放出來，進而以美學的姿態探入形式的奧妙。如同他評碧許的詩：「原來她所散發的詩的光度與能量，並不一定悉數來自陳舊或翻新的命題，其實最基礎的動力，正是她簡約的微眇而充沛，無往不利的句式、章法，和精緻的音韻每每於文字的取捨之間春容往返。」<sup>5</sup>依此線索看來，他常並提詩與哲學，而以渾

<sup>3</sup> 套語「利涉大川」，另見於〈需卦〉、〈訟卦〉、〈同人卦〉、〈蠱卦〉、〈大畜卦〉、〈益卦〉、〈渙卦〉、〈中孚卦〉、〈未濟卦〉……等。

<sup>4</sup> 可參楊牧：〈序文〉，《隱喻與實現》（臺北：洪範書店，2001年），頁3-4。

<sup>5</sup> 引自〈解識踪跡無限大〉一文，收入楊牧：《人文踪跡》（臺北：洪範書店，2005年），頁58。

成一體視之，但在同時關照文與哲之際，其學術座標顯然略微偏向「文」一點。人文學科的養成，理應在文與哲全方位的洗禮與不斷的對話中再各取所需，從而展現會通的視野與專業的魅力。不知文哲所初始的立名，可否有取意於文與哲所交會之慧光。反觀當今學科的專業架構如此涇渭分明，這樣的願景期待，不知可否已成難以體現的理念或無從苛責的奢求？

《易經》與《詩經》同樣具備口傳作品的特點，每每召喚、凝聚更多人的集體記憶。記得大陸民間諺語、民俗學專家安德明教授二〇一六年三月至六月前來東華短期講學，由於他常跑田野，一直都是一副黝黑厚實的模樣。他返回大陸前，希望我可以帶他去向景仰已久的楊牧老師致意，於是在五月某個夏日寧靜的午後，我們相約一同登門造訪楊牧老師，盈盈師母還細心地為大家備茶與點心。安教授從楊牧老師《鐘與鼓——《詩經》的套語及其創作方式》一書談起，認為該書分析《詩經》存在著諸多套語，顯示其保留著口傳作品的特色，此一觀點開啟民間文學研究者得以從經典的源頭見證「眼光向下」的人文精神與文化視角。雖然大家只是夏日午後的輕鬆暢談，宿舍外不甘寂寞的庭園猶不時傳來蟲聲相伴，在這一場現代漢詩的大師（楊牧老師好白）與民間口傳諺語專家（安德明教授好黑）的相遇對話中，卻使我更了解傳統漢詩的原生形態與民間性格，並再一次看到文學出入於雅俗之際而得以延綿不絕的生命力。

### 三、以創造維繫傳統，憤憤令人思

剛來東華任教時，楊牧老師擔任東華人社學院院長。猶記有一次他帶我去參加學校的教務會議，主持人教務長熟稔於校務，極重細節，一開起會來就是沒完沒了的數小時光景，他一臉不耐煩地跟我說：「其實這種會半小時就可以結束了！」在王文進教授擔任主任召開系務會議時，總會體貼地跟他說：「中午時段你需要午睡，就回去休息吧！」他看看議程，了解並無要事，便會悄悄地走了。後來中研院文哲所的某位老師，認為楊牧老師被我們東華中文系寵壞了，其實「不喜歡開會」、「不耐煩一般瑣碎的庶務」應該是他一貫的作風。這讓我想起一段有關王導「不復省事」的掌故：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世說新語·政事》）

在這處處講究規範、形式掛帥的教研環境裏，實與楊牧老師無為簡易的作風格格不入。回眸他一路走來的人生步伐，不論擔任何種職位，扮演何種角色，總是能如此疏緩從容，自在適性，有人不禁羨慕地說：「他就是天生好命！」的確，楊牧老師有一種與生俱來不喜成規成矩的高貴名士氣，但我仍留意到，他固然無心於俗務，崇尚簡略，卻每能在重要場合上掌握大原則，表達前瞻性的意見。看似沉默不喜發言，遇到該講話的關鍵時刻，不必飲酒就能為理念為正義發聲了。可見名士之逸氣，有所謂「有逸之而大、有逸之而真而純」者，亦有所謂「有逸之而小，有逸之而偽而雜」者<sup>6</sup>，兩者自不可相提並論。賈伯斯有云：「簡約是細膩的極致。」而我以為，能夠以簡御繁不僅是楊牧老師的風格，更是他的高度。

他看我總是事事精實而忙碌，有一次便直接問我說：「你到底都在研究室裏忙什麼啊！」我說：「學界總有審不完的論文、專書、計畫、升等與聘任等工作需要協助！」他苦笑後還叮嚀我說：「你總不能老看一些沒有營養的東西啊！」初聞這番話，看似不解我們中生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辛苦，又何嘗不是一針見血的規箴之言！學科的發展建立客觀化的制度固有其必要，在科技專業的主導下，我們隨之共構了龐大、森嚴、繁瑣的學術體制，卻讓彼此在遊戲規則中作繭自縛，甚至在無形中都被體制綁架了、收編了，並逐漸成為被馴服的籠中鳥。因為務「實」過了頭，就失去留白與餘裕的空間，愛因斯坦說：「學術生涯迫使一個年輕人拿出科學成果，而只有堅強的人才能抗拒膚淺分析的誘惑。」短線與量化的規範已在侵蝕人文學科的命脈，目前還找不到如何復原的出口。楊牧老師每以創作實現其學術的使命，他說：「創造乃是維繫偉大的傳統於不墜的唯一的手段。」<sup>7</sup>由是在他主持中研院文哲所的時候，不時為此學術殿堂帶來創作者的火花，並且身體力行，成就一段難以複製的璀璨時光。面對如今學術的發展逐漸走向僵化，造成窄化與弱化的病狀，我認為楊牧老師重視創作、擺脫體例的繁文縟節、強調書寫的自由與溫度，對於我們下一步的轉機與蘊釀第二波的改造新路，未嘗沒有啟示性的意義。

猶記東華大橋尚未通車、盈盈師母沒有常伴其側之時，我曾載楊牧老師到鄰海的門諾醫院給朱戈靖醫師看病。在返回東華大學的路上，仍必須繞道重回靠山的臺九線，不禁向他說道：「真不知蓋了多年的東華大橋，何時才可以順利通車？」他

<sup>6</sup> 見牟宗三：《才性與玄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頁69。

<sup>7</sup> 引自〈新詩的傳統取向〉一文，收入楊牧：《隱喻與實現》，頁6。

笑著回答當時還很年輕的我：「冠宏，這是我需要擔心的問題，你生命的時間還長呢！」回到學校後，他說自己累了，問我可否幫他到湖畔餐廳買個湯麵當作他的晚餐，只要跟老闆娘說他要吃的就可以了。我依照他的指示前去湖畔買麵，想著也為自己買個一樣的湯麵吧！當提出我的要求時，老闆娘瞪大眼睛一臉疑惑地問：「你真的也要嗎？那很難吃喔！」原來是一碗淡而無味的湯麵！也許正因為平淡無味，可以返無全有，海納百川，因此當晚吃起來，就別有一番滋味了。

最近因為知曉風水的家母為楊牧老師確定東山樂園的墓園方位，盈盈師母客氣地託楊牧老師的胞弟楊維邦教授送禮到家母開設的順光佛像中心，以表達謝意。兩位長輩聊一聊後，楊維邦教授來信說：「聊了以後才知道，我們還是親戚呢！」花蓮真小，但楊牧老師給我的世界很大，尤珍惜因他而有的點滴記憶，以及不斷揚起的生命漣漪，還有那我們彼此都深愛的波瀾壯闊之文化長流！

（本文收錄於須文蔚主編《告訴我，甚麼叫做記憶：想念楊牧》，時報文化 2020 年出版）

## ※ 王靖獻教授紀念專輯 ※

# 冬天晴日清晨仰望奇萊：懷楊牧

須文蔚\*

此刻我侷促於時間循環  
今昔相對終於複沓上的一點  
山勢縱橫不曾稍改，復以  
偉大的靜止撩撥我悠悠  
動盪的心，我聽到波浪一樣的回聲，當我這樣靠著記憶深坐  
無限安詳和等量的懊悔，仰首  
看永恆，大寂之青靄次第漫衍  
密密充塞於我們天與地之間——

——楊牧〈仰望：木瓜山 一九九五〉

我喜歡在冬天晴日清晨，驅車繞過木瓜溪橋的涵洞，沿著木瓜溪南側河堤走，找個野草不那麼長的石坡，助跑一段，一口氣爬上大小不一的鵝卵石鋪就的志學堤防。

先映入眼簾的是洶湧的芒花，川流在荒溪兩側，溪水瘦弱在砂礫和碎石間閃躲，閃爍如晨星。沿著河堤走，不遠處是木瓜溪大橋，汽車終日南北穿梭，花東線火車也不時轟然駛過，不耐顛簸的旅客通常都沉睡夢鄉，根本沒機會體會溪谷與山脈的奇景。

楊牧先生曾帶著朋友在橋中央遠眺，在《奇萊前書》序言中，他提及：「就在我們到達橋中央一剎那，朋友認真地說：現在你向右看。大家都相信，他說，從花蓮望過去，這是唯一直接看得見奇萊山的地方——早上天剛亮的時候。然後呢？我問。然後雲靄就將那山遮起來了，他說：太陽光照到的那一刻。我們相繼接不上話

---

\* 須文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來，各自沉默，眼睛望著窗外。」是的，在登山客口中敬畏的「黑色奇萊」，不用搏命負重攀爬，幸運的話，雲霧敞開，在木瓜溪大橋一帶可以抬頭望見夾著溪谷層疊而上的山巒最高與最深處，便是險峻孤絕的奇萊山。

神秘的奇萊不是隨時都能瞻望，最讓人驚奇的絕美雪景更是羞澀如宅男，不是年年可見，要聚足許多因緣方能現身。首先要強烈大陸冷氣團過境，又遭逢水氣充足，高山下起皚皚白雪，這往往要三、四年才閃現一次。就算是卓爾群峰都染白了，霧重雲深總是一把鎖，鎮日鎖住山光霜影。所以在壽豐住久了，就會特別在冬日等待一個好時機，當強烈寒流與冷冽冬雨消停，清晨如果冬陽暖暖，岫谷裏的雲漫步到花蓮溪口，晴空萬里，就該趕緊前往木瓜溪，那是平地可以觀賞奇景：近處的木瓜山翠綠，稍遠處偉壯的山峰蒼鬱，襯托出奇萊連峰積雪如一個藍天下打著純白圍巾的青年，為平野上的人朗讀詩。

每每在這個時刻，我心中都會浮現楊牧〈仰望〉一詩的句子：

我以為那是恐怖與溫柔  
懸空照面，輕撫我一樣的  
犀利，一樣陡峭，光潔的額  
少年氣象堅持廣大  
比類，肖似。然後兩眼闔上……  
縱使我躊躇不能前往  
你何嘗，寧不肯來，準確的心跳  
脈搏？

青空把奇萊主峰往前推了幾百里，從詩人的少年歲月走來，如同朝思暮想的情人，如同《詩經·鄭風·子衿》裏的綿綿情意：「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少年呼喚山，不用走向山，在激情的心臟搏動中，奇萊從幽谷中步出，更從歷史中走向臺灣文學，成為花蓮的象徵。

〈仰望〉一詩發表二十餘年後，東華大學將行之多年的文學獎命名為「奇萊文學獎」，華文系的系刊由楊牧先生題名為《奇萊文訊》，研究生自主發起的全國研討會也稱為「奇萊論衡」，最近花蓮縣文化局的刊物也更名為《奇萊有誌》。究竟是什麼樣的魔力？一首詩以及其後出版的散文集《奇萊前書》，竟然能打造出一座文學家園，創造出屬於花蓮書寫者共同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乃至人文地理學家 Crang 所稱的「場所精神」？答案或許可以在志學堤坊上遠眺中，慢



慢尋覓。

面向山谷右側，眼前最近陡拔起的是初英山，其身後是七腳川山，看顧著吉安和花蓮市。楊牧先生總愛細數著七腳川山之後：「更遠更高的是帕托魯山，立霧主山，太魯閣大山，在最週邊而想像中還能看清楚的是杜銜山，武陵山，能高山，奇萊山，奇萊主山北峰高三千六百零五公尺，北望大霸尖山，南與秀姑巒和玉山相頡頏，遠遠俯視著花蓮在沉睡，一個沒有新聞的小城。」而就在太平洋戰爭的末期，美軍開始轟炸花蓮時，不僅劍指花蓮與吉安周邊的機場與陣地，當楊牧一家人倉皇逃難往南行，經過木瓜溪，跨進壽豐時，共和村裏的糖廠也因為製造國防工業用的糖蜜與工業酒精，不能倖免於難。

少年楊牧就曾在一個寒流來襲，溼冷籠罩著溪谷的時刻看見：「俯視的峻嶺穩重地立在那裏，桑巴拉堪山，立霧山，奇萊山，峰頂積著白雪，比挫折中的統治者和惶恐的臺灣人更沉默，沉默地守護著，卻必然也輕輕訴說著些什麼。我是聽得見山的言語的。」奇萊山敘說往事的言語從未停歇過，從芒草上飛過的烏頭翁唧唧，自彈奏著鐵橋與陸橋的山風呼呼，乃至更遠方狹仄的山坡地上太魯閣族和撒奇拉雅族的歌謠，和聲傳播，無一留有文字卻道出了：灣生在吉野村裏的優越生活，還有硝煙中讓日本殖民者壓迫的人們，投身在建築軍事工事，甚至獻身於神風特攻隊的瘋狂行動中，他們沒給報紙和史書記載的喃喃低語。

面向山谷左側，逼近目光的是鯉魚山，山後群嶺擁抱的正是鯉魚潭，山前平野上星羅棋布的小村莊，或名為忠孝新村，或名為共和村，都是安頓國共內戰後來臺的退伍軍人，戰士解甲，所授「田地」多為砂礫與卵石密布的河川沖積地。在茂密的甘蔗田中，建立起了東華大學，一九九五年十月久別故鄉的楊牧歸來，籌組一個夢想中的中國語文學系、英美語文學系以及人文社會科學院。

當時楊牧剛離開香港科技大學，或許在香江期間並不太順遂，所留下的詩篇收錄在《時光命題》中，不乏悲觀與失落的句子，最強烈的嘆息如〈樓上暮〉：「這個世界幾乎一個理想主義者都\沒有了，縱使太陽照樣升起。我說\二十一世紀只會比\這即將逝去的舊世紀更壞我以滿懷全部的\幻滅向你保證」。顯然日漸趨向功利的學術環境，讓詩人難耐，繁複的教育行政工作，更讓學者躊躇，他誠實的寫下：

然則高處或許是多風，多情況的

縱使我猶豫畏懼，不能前往

想像露水凝聚如熄滅的燈籠  
鳥喙，熊爪，山豬獠牙，雷霆  
和閃電以虛以實的聲色，曾經  
在我異域的睡夢中適時切入——

縱使有所遲疑於高處的風寒，但源於奇萊山中原始的生命力，恆常的靜止與安定，從融雪的溪澗蜿蜒注入了山腳下新興的校園中，安定了返鄉遊子猶疑的心情，也灌溉了一個嶄新的文學殿堂。

當我戀戀不捨從無人的河堤上，為了趕赴授課，暫別潔白炫目的奇萊主峰，回學院的路上，我想，我知道了：在一九九五年的冬天，因為詩人纏綿的鄉土情思，無限的勇敢承擔，奇萊就成為了東華文學人的基因密碼。在脈管跳動的是山嶺中的原初神話，在文字中迴盪的是山通大海波濤的回聲，在書寫時總愛揮尸霍記憶與想像，在脆弱時懂得選一個視野開闊的校園角落，坐進無限平和與安詳的空氣中，仰首看永恆！

## ※ 王靖獻教授紀念專輯 ※

# 我所認識的王靖獻所長

潘少瑜\*

二〇〇三年春，經由柯慶明老師的介紹，我到中研院文哲所擔任王靖獻所長的研究助理。當時我還是博士生，沒做過什麼正式的工作，懵懵懂懂，只記得面談的時候，所長很親切地問我在臺大的碩士論文寫些什麼，好似在意我的學業表現多過於工作經驗。等我正式開始上班之後，所長也維持著一貫的立場，甚至跟我說：「不要花太多時間工作，要多讀自己的書。」得到老闆這樣大方的許可，於是我在文哲所的時候，多半都在讀書、查資料、聽演講，以及協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與《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的英文編輯校對，相較之下，所長交代的工作反而是最輕鬆的。回憶那段日子，我簡直像是領了獎學金去做自由研究一樣，每天沉浸在學術的氛圍中，也結識了許多海內外學界的師友，無比幸福。

所長曾抱怨文哲所太安靜了，不像大學校園裏有學生熙來攘往，洋溢青春氣息，可能也因為這樣，我似乎被他當成了學生，而不是屬下。我總是稱呼他「老師」而不是「所長」，他也欣然接受。我白天工作，晚上寫我的英文碩論，完成之後寄給倫敦大學 (UCL)，也複印了一本送給所長，作為留念。沒想到過了幾天，所長竟把那本論文還給我，上面用鉛筆做了好多批註，鼓勵我繼續精進，他真的變成我的老師了！所長曾在文哲所舉辦過「面對作家」系列演講，分別邀請了白先勇、陳映真、痲弦等著名作家來分享他們的心路歷程，讓文壇大師們為這擅長抽象思辨的象牙塔注入更多的創作能量，也讓研究員們親炙自己研究的對象，感受他們的生命溫度。這幾場演講都座無虛席，除了學者之外，更吸引了許多年輕學子來參加，他們眼神熱切、抱著心愛作家的著作大排長龍等待簽名，讓文哲所平日的冷清蕭瑟為之一變，這也是所長懷念的某種「大學校園」的氣氛吧？

---

\* 潘少瑜，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擔任所長的研究助理前後一年多的時間，我不經手行政業務，只負責幫他打字、借還書、整理各式稿件和校對，《英詩漢譯集》和重新出版的《楊牧詩集 I、II》便是我那時的工作成果。每天早上進辦公室，接到所長的電話，我便下樓去拿他的稿子和英詩底本，打完中英文兩種版本以後，在中午前印好交給他。午休後他在初稿上稍作修訂，我再把它打字列印出來，讓所長進行二校，然後定稿，一本厚厚的《英詩漢譯集》便這樣日積月累地完成。所長每天譯詩的字數其實很少，大約一百字上下，配上英文原詩，其實打字用不了多久（比較花時間的反而是辨認他的筆跡），但我每次交稿給他，他都很驚訝地說怎麼這麼快，所以有時我會故意晚一點交，讓他比較沒有心理壓力。除了打字以外，所長也經常要我到文哲所圖書館幫他借書，例如英美詩人的詩集、*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之類，主要是為了翻譯所需。當然，他對那些詩作早已爛熟於心，只是需要稍加斟酌參照而已。有一次比較特別的經驗是，所長交代我去借幾本棋譜，說是寫詩要用，可惜我沒有追問，到現在也不知道他究竟在研究棋譜之後寫出了怎樣的詩句。

所長和我在身分證上的生日是同一天，雖然那不是他實際的生日。我總覺得同樣身為處女座，我非常能理解他的龜毛、彆扭和害羞，甚至覺得一個六十幾歲的人，還有著孩子般的個性，真是太可愛了。所長對於自己未完成的手稿非常在意（我何其有幸，能成為第一個看到他剛出爐的作品的人！），記得有次我在走廊上遇到戴著草帽正要去吃午飯的所長，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張對折的稿紙交給我，低聲說：「不要讓別人看到。」只不過是一張等待繕打的手稿，卻弄得好像什麼小學生的秘密一樣，至今想起還是令人莞爾。還有一次，所長出席了一場關於現代詩的學術討論會，會後幾位老師閒聊，隨口問所長最喜歡的詩人是哪一位，他立刻說：「這是秘密。」在場所有的人都笑了，楊牧都已經成為諸多學者顯微鏡下的研究對象了，為何對於這樣的「必考題」仍是扭捏不肯回答呢？

儘管如此，屏除了外人的干擾，所長在文字的世界裏是優遊自在、大膽奔放的。詩歌翻譯向來被視為對譯者最艱鉅的挑戰，像所長這樣一位在國際上享有極高聲譽的詩人，將他的淵博學識和敏捷詩才灌注到譯詩工作上，自是能夠精確嚴謹而又圓轉如意，偶爾也點綴了他個性中俏皮的一面。有次我發現所長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裏有一句「並且在美眉上挖掘壕溝若干條」（原文是“*And delves the parallels in beauty's brow*”），覺得新鮮有趣，便探問所長是否知道時下年輕人所謂的「美眉」是什麼意思，他笑著說：「我知道啊！」莎翁的經典詩句在所長的譯筆

下因而增添了臺灣本土的流行感。又如他將馬羅的詩句“The shepherds’ swains shall dance and sing / For thy delight each May morning”翻成「年輕的牧人將舞蹈唱歌，在五月的早晨為你你愛」，我狐疑地問所長，句中是否多了一個「你」字，但他顯然是刻意如此安排的，打破了中文的既有文法，在譯詩中準確地呼應原文，並創造了新的語言韻律。所長曾不無得意地說，他在翻譯某位西方大詩人的作品時，覺得有些句子寫得不好，所以就直接把它改掉了。這樣狂妄的譯詩者，世上除了楊牧，不知還能有幾人？

所長習慣用鋼筆寫字，他的字跡樸拙而有童趣，手稿上塗抹修改的雜亂線條，體現了他字斟句酌的苦心，連標點符號的運用，也絲毫不能馬虎（例如他堅持不用頓號）。有次所長要到某地演講，事先寄了講稿過去，但是當天早上他臨時決定要修改其中一些字句和標點（改動處不超過十個字），要我趕緊改好傳給對方，並印發這個新的版本。我打電話跟對方連絡，他們說講稿已經影印了幾百份，恐怕沒辦法重印。我向所長回報，他很生氣地說：「如果不能改的話，那我就不要去了！」我忍不住噗哧笑出來，當真為了區區幾個字的差別就要取消演講嗎？雖說如此，我還是忠實地跟對方轉達了所長的意思，他們大概也沒料到事態會如此嚴重，只好趕緊遵命照辦。在所長身上，詩人的認真和任性可說是一體兩面，為了安頓每個字詞與標點符號，讓它們找到最完美的位置，表達最精準的語意，必須要有超乎常人的堅持，而周遭的人也必須給他足夠的空間，保護他天性的真淳。

本質上是詩人和學者的所長，對於行政庶務不太有興趣，過多的公事會妨礙他的創作繆思，這大概是他在文哲所時不怎麼快樂的原因。所長的辦公室有一張木質大書桌和旋轉皮椅，堂皇氣派，他在此處理公事；而靠窗有一排矮櫃，上面擺了一盞小檯燈，旁邊放了一張摺疊椅，就權充他寫詩、譯詩的私人角落。不知有多少次，我看到所長站在窗邊凝望蒼翠的綠意，他的心似乎在很遠的地方。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九日那天下午，我從媒體上得知正副總統遭到槍擊的消息，震驚無措，不知臺灣未來會有如何變局，但是當我拿著修訂稿走進所長辦公室，看見所長就著昏黃的燈光坐在矮櫃旁，他微笑地從我手上接過稿子，不知怎麼，我突然就放心了。即使來日大難，地覆天翻，只要我們的詩人仍在寫詩，這世界就還在它的軌道上。

所長身為特聘研究員，在文哲所樓上有一間個人研究室，裏面擺放的物品不多，主要是一些洪範出版的書和一套迷你音響，當他需要獨處的時候，就會到那裏去。二〇〇四年底離職前，我到研究室去找所長，不免俗地想請他在書上簽名留

念，還在門外就聽到震耳欲聾的艾爾加大提琴協奏曲，而且是最激情狂放的杜普蕾的版本。我很意外他會喜歡這樣的音樂，平日總是神態蕭閒的所長，內心竟然如此洶湧澎湃嗎？那些年，所長的身體健朗，膚色白裏透紅，眉宇間有一股慈祥和藹之氣，望之儼然，但他胸中的丘壑塊壘，恐怕不是年少的我所能測度的。

離開文哲所以後，我曾接到所長的電話，要我幫忙校對他新譯出的一批英詩，也因此我手邊仍存留一包他從美國寄來的手稿。時光匆匆，如今所長已仙逝，翻閱這疊厚重的手稿，使我想起當年，每天上午我走進那涼風習習的辦公室，所長站在綠意盎然的窗畔，回過頭來看見我，淡淡地笑著說：「哦，少瑜啊……」已是記憶中的永恆畫面。

## ※ 王靖獻教授紀念專輯 ※

# 「凡虛與實都已經試探過」： 楊牧老師的一門課

何雅雯\*

大學時代，我偏好的是更濃密一點的風格，並不特別注意「楊牧」。知道好，知道應該讀，但總是被其他讀物搶去了時間。那時候和「楊牧」最接近的狀況其實是，每隔一陣子我會騎著單車晃到洪範書店，單車停在廈門街，揹著雙肩背包上了二樓，買回頭書。我知道楊牧是洪範創辦人之一，知道洪範每一本書的摺頁簡介文字，幾乎都出於楊牧之手，如此而已。

一直到大學畢業的暑假，已經選了碩士班的課，知道會修現代散文史專題討論，整個暑假都在讀各家散文集，自然就再度跑去洪範搬回了全套楊牧詩文。恍惚記得，當時曾有一度溽暑中搭長途巴士，車上沒多少人，我坐在最前排，眼前是高速公路，手上是《方向歸零》。少年時有一點創作的野心，或者說還急著讓人了解自己，於是總有很多話想說，想寫，但讀著《方向歸零》時，我有一種「啊，此後不必寫甚麼也無妨了」的滿足感。

小時候去過花蓮，在太平洋濱撿拾過鵝卵石，追逐過連通遠方的海浪。那是臺北小孩的遠方，而昔日曾有花蓮少年虛構著更遠卻又更近的人生。彷彿有一個我都不認識的自己，經過他人而獲得敘述，因為敘述而完整、遷變。

因此，我其實沒有打算以「楊牧」作為研究對象。那是不可說、不必說的，自我的閱讀。

所以碩士班前兩年，我雖然一邊跟著何寄澎老師連續參與了幾個以現代散文流變為主的國科會（今科技部）研究計畫，一邊思考著的碩士論文主題卻幾乎都與「楊牧」無關，而是在晚明、唐詩、五四之間跳來跳去。

---

\* 何雅雯，韓國西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值此之際，「王靖獻」老師已然回到臺灣，我屢次聽到在東華工作和讀書的朋友們提到東華風景：王院長走在路上被某某老師攔下來，某某老師不知道在說甚麼，王院長一臉出神的樣子……等等。有一天下午，又和何老師討論起我的碩士論文，老師忽然提議：你喜歡楊牧，不如論文就做楊牧？

是啊，就是這麼隨意定案的。以前每次談到論文要做甚麼，談過之後都會去圖書館搬一堆書回家，讀了半天，考慮自己的興趣、秉性、學界發展，總是難以下定決心。但決定論文就寫「楊牧」，從想都沒想過到此定案，大概就是幾分鐘而已。

這才開始讀各種評論和紀錄，讀浪漫主義藝術與文學相關論著，讀濟慈和葉慈的詩。還寫了研究計畫要申請碩士論文獎助，記得當時的章節安排包括楊牧散文與《史記》的關聯、楊牧詩與浪漫主義詩歌比較等等。這時候東華的朋友們熱情報馬：「下學期楊牧老師要在博士班開中西比較詩學！」

所以碩士班三年級的上學期，我其實已經把學分修完了，應該開始寫論文，卻每星期二上午七點出門，搭火車去花蓮旁聽楊牧老師的課，晚上搭飛機回臺北。

我記得第一堂上課時，老師不太樂意學生旁聽的，東華中文系大學部和碩士班的學生都被老師勸退了。理論上我也是碩士生，又是他校，唯獨仗著我從臺北千里迢迢跑來，老師沒有明確地說不可以，我也就這樣賴下來了。

當時 Hazard Adamas《西方文學理論四講》剛在洪範出版，楊牧老師讓我們從這本書開始，先談理論架構。我的書留在臺北，為了回憶這段時光，特別從網路上再買一本寄來韓國，反覆翻讀，完全想不出當時老師和我們討論了甚麼。其實應當花了兩周的時間？甚至可能更多？但我記得的都不是關於這本書的觀念析辯，而是老師不斷舉出的例子：老師喜歡講但丁，講平達耳，講希臘羅馬史詩裏一支莫名岔題的長槍，關於那把長槍的細節描繪，飛行路線。

談完理論，那個學期就談《詩經》和《楚辭》。對我來說這都是中文系基本功課，但老師從 Quest 切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是 Quest；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是 Quest；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也是 Quest。老師還談聖杯的追尋，談圓桌武士：必須真正完美才有資格尋獲聖杯，然而最接近完美的 Lancelot，因為與王后的關係，也喪失了資格。如果加上老師自己的《搜索者》、〈她說我的追尋是一種逃避〉等等，探索追尋，無非都是 Quest。Quest 是所有英雄的任務，是英雄典型的出發與完成，是英雄的一生終於成



為史詩的關鍵。於是老師也談我們通常忽略或當成周代歷史材料的〈大雅〉，老師談其中的英雄人格，我不知道是不是與此同時，或者稍有時間之先後，老師寫了論文〈周文史詩〉。

上過楊牧老師的課，或者曾與老師有所交誼往來者，大概都會覺得老師其實不是案頭上那個雍容典雅的作者。我自己不能飲酒，但常聽聞老師飲啤酒，總說某次與誰誰誰邊喝啤酒邊聊了甚麼。老師上課的風格也並不端肅，總是希望學生多談、多說，然後老師會稍加點評。記得有一次討論〈關雎〉，我臨時有種想法，隨口一說，現在自己都不太記得說了甚麼，只記得老師的評語：你這個想法很接近新批評。若同學說完了，輪到老師說，他會從眼前講到天邊，從詩騷講到史詩，再講到詩人穿燈芯絨褲子，講到現代詩。這和老師的文風彷彿也相類：《搜索者》、《疑神》、《星圖》以來，乃至《奇萊前書》、《奇萊後書》系列，每一集都是一篇宏大的架構，其中每一篇都既自足，又需要他篇補完，都由此至彼，如山岳、如海濤，連綿不絕。

這門課是一整年的，我本來還想寫一篇期末報告，並且接著旁聽下學期。但農曆年前忽然接到國科會通知，碩士論文獎助申請通過，七月要交出論文。我從悠哉悠哉每星期去聽王靖獻老師上課的旁聽生，變成十萬火急必須把關於楊牧的論文寫完的研究生，於是沒辦法繼續這樣悠然往來的行程了。老師另外和我在臺北相約，就在老師家樓下的「四季」，放開了讓我問各種課堂間不宜問的、關於「楊牧」的問題。我其實沒有問出甚麼特別的東西，都糾結在老師的某些經歷和論辯。那時候我總覺得，這些事件總是對詩人有影響的吧，總是關涉到詩人與外物／外務的吧？但這一類問題老師都笑而不答，或者說一句過去了不重要，這沒關係之類。有些我讀不懂的詩句，想要試著套問作者本人的詮釋，當然也都失敗了，不管我怎麼問，老師都說，你要怎麼解釋都沒問題。於是我可能算是一無所獲：沒能求證任何我想勾連的詩與人；但我也可能是收穫滿滿：總之甚麼都不要管，老老實實讀詩、讀文本，我讀到甚麼就是甚麼了。

論文寫完，準備博士班考試，畢業。然後正好老師在敦南誠品有一場演講，我帶著印好的論文早早跑去，躲在角落，等到會後簽名時間才去「繳論文」。這一趟繳交論文和畢業前的繳交論文手續相比簡單很多，不需要為各種排版格式傷腦筋，但壓力非常大，總覺得欠了老師一學期的課沒聽完，論文又刪掉了各種古今中外文學淵源的比對，單純談的是一個詩人的 Quest。老師看到我，竟然只是笑開來：「你

怎麼跑來了？」那一刻，我終於又從一個上課、寫論文、面對自己的研究課題不知所措的研究生，回到單純的讀者身分。和老師的聊天也變成了選課的苦惱：博士班要修第二外國語，我正在掙扎著不知道應該選法文還是日文。老師的建議是，既然做現代詩研究，可以讀法文總是好的，不必精通，但能查字典足矣；日文也好，德文也不錯，各種語文有機會都學一學。後來我考慮研究範圍會以臺灣文學為主，需要日文文獻閱讀能力，還是選了日文，但一直記著是不是日後有機會要學學法文，也不免時常感嘆，誰像老師有那麼大力氣學那麼多種語言啊。

所以我意外決定來韓國前、忙於掌握零碎時間惡補一點韓文入門時，以及二〇一三年來韓國之後彷彿半工半讀一般，暑假與研究休假都拿來學韓文時，都隱約覺得這似乎是欠了老師的語言債：因為一直沒有把法文學起來，當以另一種語言償還。

上一次見到楊牧老師，是二〇一二年初春在紀州庵的活動中。老師看到我，笑說，你也來了，我以為你跑去哪個鄉下地方躲起來了。然後就開始招呼我吃現場各種糕餅點心，告訴我點心的由來；難得，多吃點，快去快去。後來老師另外寫了信，說起幾年間不見，現場又未能深談的掛心，以及讀我碩士論文的珍惜。老師還替我修正了論文裏的錯誤：一九八七年的〈悼某人〉，「此詩所悼念人物實為陳文成，因此才有些臺大校園的意象」。我當時無法向老師說明，我銷聲匿跡、彷彿隱居的十年間都發生了甚麼事，無法說明自己可能差一點放棄學位。事實上，二〇一二年多半也還處於一種萬事萬物無心的徒勞裏。然而收到信，重新找出詩來讀，的確就是臺大校園啊，二十餘歲的自己日日身處期間，竟未能辨認，而那故事的就是陳文成。時間，空間，與詩，似乎重新連結，校準，回歸。於是，我連在韓國的開設課程、此後研究課題都還不清楚的時候，首先打包了老師的著作，彷彿護身符一樣：那是我學術道路的起點，如今好好地回到學術的路上，好好地走向遠方，去學一種新的語言，去擔負一種新的責任，去隔海眺望家鄉，「想必也是一時介入的決心／翻身剎那就已成型，忽然／是同樣一片波浪來了／寧靜地溢向這無人的海岸」（〈瓶中稿〉）。

異鄉久居，很多人問我異同、短長、難易。其實無非就是 Quest：追尋、探究、搜索、洽問。若要說難，最難的就是每一次接獲壞消息。前幾年張亨老師過世，去年柯慶明老師驟然遠去，今年是楊牧老師。張老師、柯老師離開那年，我都還可以飛回臺灣送行，但今年卡在全世界都在鎖國狀態，我也動彈不得。剛得知消

息時，不免回顧了往來東華聽課的那個學期，因而結識的友朋，有幸在東華人口耳相傳的「People」吃過幾頓飯。也在網路上讀各種紀念與論評，並試圖抽離師生之誼，回到研究者的角色：

楊牧的難以企及，在我看來，是他真正達成了「詩人」定義。幾乎談楊牧詩的人都會提到這是一個不斷求變的詩人，他有明顯可辨的風格，但並不重複自己。兩者似乎矛盾，其實正因為他對詩人意義的追尋和踐履。他的詩需要天分但不單是天分，需要琢磨文字但不單是文字琢磨，而是在天分和文字琢磨之中，貫之以涵養的核心。這個涵養是學術的，是文學史與文學傳統的，也是精神的。這種話很容易說，我們隨便誰都可以說自己追求形式與內容與靈魂的合一，但楊牧是真正做到的人，這個追求，這個 Quest，楊牧沒有停止過。所以我們會在那個鮮明的文字風格裏看到精神的向上提升，也在精神的一貫脈絡裏看到文字的開拓演變。所以楊牧很難學，要學楊牧，得先學《詩經》《楚辭》漢魏六朝，還要學希臘羅馬莎士比亞浪漫詩人現代主義，最好再學學植物與動物、季節與地理。吾友楊宗翰說楊牧「一人即成學」，我想那是因為，楊牧畢生都在學，楊牧的詩並不濃稠，有時頗以疏宕為美，但本質相當地厚，這是厚積而薄發的。

然而這不容易，對我而言，暫時還無法用理論或語彙去分析、論斷「楊牧」。那是自我閱讀史的一個標記，是教過我讀書的老師。於是只能重新讀詩，最宜於送行的當然是〈雲舟〉，那確實就是老師的 Quest，是老師寫作、研究、教學，貫徹生命與魂靈的主題。我甚至懷疑那是老師讀陶詩，因而預為自挽之歌詩：

凡虛與實都已經試探過，在群星  
後面我們心中雪亮勢必前往的  
地方，搭乘潔白的風帆或  
那邊一逕等候著的大天使的翅膀

早年是預言這樣說，透過  
孤寒的文本：屆時都將在歌聲裏  
被接走，傍晚的天色穩定的氣流  
微微震動的雲舟上一隻喜悅的靈魂

2020年6月，首爾



## ※ 王靖獻教授紀念專輯 ※

# 有人：紀念王靖獻所長 在文哲所的日子

廖肇亨\*

王靖獻老師在中研院文哲所的時光不長，但還是他學術生涯中不能忘記的重要一頁。

歷經十餘年的籌備後，文哲所正式成所後的首任所長意義非常重大。正式成所之前，各種耳語傳言紛紛不斷，諮詢委員會頻繁召開，籌備處主任鍾彩鈞老師當時任內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應該就是讓籌備經年的文哲所正式成所。誰來為這個新成立的研究機構掌舵，備受各方注目。如今想來，鍾老師當時擔任籌備處主任多年，任勞任怨，一切尚稱平穩，竟然沒有直接扶正，內心不知作何感想，我也一直不好意思問他這個問題。在我服務中研院的記憶當中，與所內諮詢委員最密集開會的時光，好像就是那段時間。當時的諮詢委員都是我們從學多年的師長，從諮詢委員召集人杜維明老師開始，戴璉璋老師、鄭清茂老師、曾永義老師，連同海外的王靖宇老師、余國藩老師、李歐梵老師都猶在盛年。諮詢會的晚宴杯觥談笑，意猶未盡，私下另約飲宴也好像順理成章。一度我誤以為天堂就在身邊。雖然我們都已經過長年的奮鬥，但拿到博士學位，正式開始工作時，那時文哲所尚未正式成所；當時諮詢委員好像監護人，對年輕的同仁而言，天塌下來也有人頂著，可以放膽自由進行知識的探尋之旅。不過，當時諮詢委員最重要而正式的任務，其實是為文哲所尋找一個合適的領導人。

雖然如此，所長的探尋過程非常複雜，也有各方正式與暗中的角力，其間種種實不足為外人道，王靖獻老師最後出線，還是十分出人意表。在此之前，他一手催生了東華大學的文學院，特別邀請鄭清茂老師主持中文系，行政業務也有某種程度

---

\* 廖肇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的熟稔不在話下。然而大學的生態畢竟不同於中研院，王靖獻老師雖然早已是當代文學史不能忽略的一代宗師，但也明顯地對於中研院的生活環境與學術生態不是十分適應。

第一次看到初代所長，是他還未正式就職之前，有人帶著他巡視全所。初次見面也就是簡單地寒暄，我想大概很少人會很認真地跟頂頭上司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高談闊論，而他應該對眾人的崇敬仰慕早就習以為常，也毋須再特別錦上添花。我印象中，王靖獻老師可能是歷屆所長中，待在所長室時間最少的所長。有時在他研究室門口，有時在圖書館。

時間雖然不長，但好像也慢慢就熟了起來。鄭清茂老師、林文月老師、曾永義老師都是所長多年摯友，感覺上就是練功房中在外雲遊多年的大師伯。在新進人員報告之後的第一場正式輪值演講，我記得當時是我第一次報告僧人的山居詩，其實講完之後，現場聽眾幾乎如聾似啞，主持人徵求所長的看法。他想了一下，說：「看來寒山的詩好像真的很流行。」然後又陷入良久的靜默。我印象中，他倒是對衣若芬講蘇東坡特別欣賞，說研究蘇東坡真是一件非常令人羨慕的事。當時我們都才剛出道不久，有一次曉真在會議說了一些什麼，他突然有感而發的說：「年輕人都以為未來還很遙遠，其實一下子你就變成資深人員。」曉真馬上接著說：「我不要。」與會大家哄堂大笑。其實真的一下子，大家都變成資深人員，這一切，昨日儼然未散。

二〇〇四年，東京大學藤井老師策劃了一個臺灣文化的會議，邀請文哲所一起合辦。當時張文薰、林桂如還沒畢業，我幫藤井老師聯繫一些臺灣的老師們，名義上是由所長帶隊，那時我報告臺靜農先生的《亡明講史》一書。柯慶明老師、陳萬益老師都不知道這份手稿，雖然展覽是柯老師籌劃的，但他也不記得。會後我帶著老師們前往箱根，我才知道所長對坐大眾工具很抗拒，師母說所長很排斥幽閉空間，但我在東京從來沒坐過電車以外的交通工具，遊覽車云云根本從來沒想過。不過當天回到新宿車站，黃英哲老師好像後來也加入，倒是賓主盡歡，啤酒仍然近乎無限暢飲。

王老師的晚宴大概是歷來所長當中頻率最高的一位，有時他作主，有時是別人邀約，印象中，有一兩次好像是林文月老師作東。記憶中有福華的江南春、亞都的天香樓、欣葉本店、紅豆食府、敘香園，都是一定級別以上的餐廳。大木康老師那陣子在臺灣中央大學客座，到臺北的時候，往往就會與所長一起飲宴。有陣子，大

木康老師除了啤酒之外，只喝威士忌，與所長習慣甚合。談學問、談人、談食物，或許在我們當時那個年紀，能體會的前代風雅就是如此這般。

所長應用他在文壇的影響力，邀約重要的作家，在文哲所舉辦「面對作家」系列演講，邀請林文月老師、王文興老師、黃春明先生等人，每場都是座無虛席。黃春明先生那一場，是我開車去接他來的，會後照例也有餐會，但記憶都已十分模糊。所長常以計程車代步，而所有的鈔票會裝進師母準備的小塑膠袋，由司機直接取走，我第一次看到時大吃一驚，如此優雅的堅持，真不愧是處女座的男人。

王靖獻所長雖然以詩人名世，但仍舊是因學術研究成績來任文哲所初代所長，與他在文壇的崇高地位無關。我當年讀到徐復觀先生寫給所長的公開信，覺得十分親切。他雖然是比較文學出身，傳統的功底還是很紮實，除了《詩經》以外，他也對陸機〈文賦〉下過工夫，我少年時究心文論，還把他作的〈文賦〉校釋，一個字一個字仔細讀過。他筆下的師友，特別是柏克萊時期諸人，如陳世驥、卜弼德，在學術史上都是一代掌門。不過，當時是文哲所古典文學組明清文學與宗教文學兩大陣營的黃金時期，一時稱盛，距離他的學術專長，可以說陌生又遙遠。

回想王靖獻老師在南港的日子，他不只一次抱怨南港與中研院的生活環境。中研院與一般大學不同，事實上，作風與習性都更近於政府公部門，其未必能夠完全適應實是意料中事。他雖然在香港、臺灣都參與過行政事務，但中研院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學術環境和生態截然不同，很難大展身手。不過，畢竟是創所所長，他那自由開明與海納百川的態度，還是為文哲所訂了未來發展軌跡的基調。學術研究固然不同於文學創作，但是那段日子，似乎也是我的學究生涯中，與文學最純正的本質距離最近的時光。





## ※ 王靖獻教授紀念專輯 ※

# 憶楊牧

林維杰\*

對生命的理解，並不是建立在過去延續到當前的歷史性，而是由最關鍵的記憶來決定。它像一個中心，由它出發朝八方而去，將獨立的記憶片段串連成彼此關連的意義整體。

### 1.

彼時我甫入大學，住在六個鋪位的宿舍中。我的下鋪室友是一位文青，他愛寫詩，寫得極勤。我也寫，但比較懶散。交換賞析與暗自評比是我們的相處方式。當時我讀過的現代詩很少，除了余光中的作品，就是痲弦、楊牧與楊澤。讀過之後試著提筆寫，高中時寫過一些，進入大學後也寫了一點，例如：路思義的天空很希臘，或一九三三年與革命者的對話，等等。寫完之後與室友彼此交換著看，然後投稿給系刊與學校詩刊。

一切都像是孕育某個詩人的前期工作。

某日，我的文青室友一臉糾結朝我走來。那是一個上完課的傍晚，天色有些發青，他坐在宿舍靠窗的位置，語帶沙啞地告訴我：同班的亞興得到《中央日報》與《幼獅文藝》合辦的大專生文學獎，而且是新詩與散文的雙首獎。真是晴天霹靂，我連學校的文學獎都鎩羽而歸，亞興卻已經走那麼遠了。我與室友聊了幾句，現在記不得具體內容了，大概是讚揚亞興，可能也說了些相互勉勵的話。

一段時日後，讀到學校（或是頒獎單位）對亞興的訪談稿。多年後只記得他的這句話：「楊牧是影響我詩作生命最重要的人。」

---

\* 林維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2.

亞興的詩，語言簡練，節奏婉曲，意象營造極為出色，但有一種潛在的孤獨與壓抑，不甚像我讀過的楊牧詩作。或許我讀的楊牧詩太少，又或許亞興受的影響是我未曾觸碰過的、所有傑出詩人都具備的另一種深沉。

一個詩人對另一個詩人究竟是如何影響的？這些年來，我從未問過亞興，也沒有確切的想法。亞興後來赴另一所北部大學讀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後回故鄉宜蘭教書。沒聽說他再寫詩了，但偶爾見面時，仍覺得他的體表隱然浮現當年的氣味。詩人得以見於面，盡於背，施於四體者，是根於心的楊牧印記嗎？

3.

多年後，我進入中研院文哲所工作，那個印記從亞興的詩人氣味中緩緩走出，具體化形為我的同事。

在我的眼中，楊牧先是詩人，然後才是主管。但我在所裏遇見他，則稱呼他為所長，有時則喚他王老師，一時不察楊老師也脫口而出，或許後者才是我對他的真正稱謂。稱呼紊亂無所謂，他總是微笑點頭，一副孕育詩作的表情從我眼前晃過。悠然，適性，像是重返凡間的高手，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每一個獲得楊牧印記的詩人，都獲得不同授權，包含楊牧自己。

4.

一次強烈的地震來襲，我從研究室慌忙逃出，一口氣由六樓衝到一樓。楊老師已在一樓大廳，詩人一貫的沉穩氣象略顯浮動，他尷尬地望著我，說道：「我在二樓比較近。」但他是花蓮人啊！

地震要如何入詩？或者打斷了他進行中的詩興？

5.

我與楊老師最後的見面是在某次的院內餐敘。他要離開文哲所了，我在眾人的輪流發言中，拿出預寫的詩作當場朗讀。

（多年未寫，心情忐忑，如果寫得不好，請多包涵。）

這是我讀完後，未曾說出的心底話。楊老師的表情很輕鬆，微笑點頭示意。我終於確認當年的決定是對的：放下文青的念想，做個哲青吧！

6.

其實我的作品也曾受到另一位詩人的肯定。高中時代，我以「四季」為題寫了一首組詩，拿給一個友人賞析。他居然在未告知作者的情形下，藉著訪問余光中的機會，請詩人指正。詩人讀完後，望著友人問道：「這位作者幾歲人也？」友人答以十六歲，詩人遂又答：「有潛力。」

唉，十六歲的潛力果然並不持久，無法支持我到二十多年後的那場餐敘。